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 论 丛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 论 丛

北京大学 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 编著
东语系亚非历史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南昌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

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编著
东语系亚非历史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字数17万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 3110·123

定价: 0.76 元

目 录

序·····	季羨林 (1)
一、中国对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影响·····	宋成有 沈仁安 (3)
二、中柬关系史上的三次友好高潮·····	陈玉龙 (23)
三、十九世纪中叶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遭遇·····	沙敬范 (42)
四、刘永福的黑旗军与中越人民的战斗友谊·····	梁志明 (54)
五、两汉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泰关系·····	徐启恒 (74)
六、汉唐时期中緬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陈 炎 (91)
七、近百年来中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相互 支持·····	赵 敬 (113)
八、中国同南亚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李开物 (124)
九、中国、印度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在反帝斗 争中的相互同情和支持·····	林承节 (148)
十、古代中国和伊朗的友好交往·····	叶奕良 (167)
十一、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关系·····	郭应德 (187)
十二、古代中国与北非人民的友好往来·····	郑家馨 (200)
十三、古代中国与东非人民的友好往来·····	郑家馨 何芳川 (225)
编后记·····	(245)

序

中国立国亚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同我们的邻国和比邻国更远的许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总起来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全断绝。这对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起了促进的作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彼此文化的内容，为我们的人民造了福利。

我们始终认为，在世界上，国家有大小，历史有长短，经济、文化发展有差别，但每一个民族都对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宝库有所贡献。那种认为某一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的议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

现在人类历史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已经大为便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来往更频繁了，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更多了。我们相信，这种学习，同过去几千年一样，一定会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互相学习以及相互支持的历史，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加强我们的团结，增强我们的友谊，提高我们的信心。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同志

们，把我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写了下来，集成这一本书。尽管可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为了加强人民间的友谊与了解的心是真摯的。就让这一本书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希望与信心，走到读者中间去吧。我们相信，它在建造人民与人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谊与了解的金桥方面，一定会起到自己的作用。

季 羨 林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中国对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影响

宋成有 沈仁安

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对近代日本的发展曾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日本明治维新又对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这种看法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笔者亦完全赞同。但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是否与日本推翻封建幕府、实行明治维新的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来自中国的影响对近代日本的发展是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应该加以探讨的课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西方殖民者武装侵略的魔爪即伸向东亚。英法北上，沙俄南下，美国东来，中国成为它们劫掠的对象，首当其冲。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击败了腐朽昏聩的清朝政府，取得了一系列殖民特权。中国开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加速并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八五〇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矛头直指清朝政府和外国侵略者，谱写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压迫、争自由的英勇篇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向锁国日本频频发出的强烈警报，引起了巨大反响，促使了日本民族从闭关自守的迷梦中苏醒过来。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德川幕府曾连续发布了五次“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和日本船只私自渡离国门，禁止西洋神甫来日本传播天主教；除允许中国、荷兰船只来日本并被限定在长崎出岛一港进行

贸易外，禁止其他国家的商船前来日本列岛。这样，幕府就把整个日本国严密地封闭起来，仅留下长崎这个唯一的透气孔与外界保持有限的联系，以图长治久安。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西方殖民者接连来到日本，要求开国通商，但幕府维护锁国祖法，严加拒绝。一八二五年，幕府更发布《外国船驱逐令》，严令沿海各藩不惜诉诸武力，轰击驶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将其驱逐出境。但是，鸦片一战中国败于洋人，被迫向英国割地赔款、开港通商的消息，通过荷兰商馆和中国贸易船传到日本，使幕府受到极大震动。一八四二年，幕府为了避免引起与外国的冲突，招致外祸，不得不撤销《外国船驱逐令》，另颁《薪水令》，改变以往那种不加区别地开炮乱轰、一律予以驱逐的生硬作法，而允许对缺乏粮食、燃料和淡水的外国船只给予供应，并“劝谕其离开日本。”^①在鸦片战争的影响下，幕府有鉴于中国事变，被迫对厉行长达二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作了上述相应的调整。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冲击不仅反映在幕府对外政策的变化上，而且也表现为日本各阶层人士对鸦片战争进程的深切关注。他们纷纷挥笔著文，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互相勾结、侵掠中国的可耻罪行，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大同情。根据一八三八年以来中国与英国就输入鸦片烟问题由交涉直至开战的各种消息编辑成册的《鸦片风说书》被大量翻刻，广为流传。记载英军侵华暴行的《夷匪犯境录》也传入日本。日本人士对英国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正木笃揭露说：“俄国高唱正义，美国号称公允，其实它们皆是虎狼之辈。较之俄美两国，英国尤为强悍狡黠”，它“惯用和、战两手，或吮人膏血，或毙人魄肉，时而为柔羊，时而为猛虎，唯利是图”，此等“虎狼之辈，殊堪痛恨。”^②甚至到鸦片战争过后十余年，即日本的嘉永年间（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四年），日本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通俗小说，如《海外新话》、《海外余话》、《清英近世谈》等，足以说明这次战争对日本刺激之深。上述小说虽情节与事实不尽相符，但作者们爱憎分明，对中国

的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如《海外余话》的故事梗概是：英军总大将英吉利国王之妹阿黛与副将义律率船队攻打中国，结果被林则徐生擒，后来道光皇帝恩赦之，送归英国。从此，英国人感念道光皇帝的不杀之恩，情愿作属国，岁岁纳贡，等等。^③其他小说的内容也大抵如此。这些故事生动地表达了日本人民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战败的情感。

鸦片战争还使日本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中日两国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由于日本即将面临的危险，更使他们为本国前途满怀忧虑。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舍长、汉学者斋藤竹堂得知鸦片战争猝发、“英夷寇清”的消息后，慨然命笔，作诗云：“海外之洲迹渺茫，忽闻西虏势腾骧。蛾眉（指传说中的英国国王之妹阿黛）解作三军师（应为帅），鸟嘴（指西洋火器）利于千段枪。铁舰胶沙推不动，绒旗委地暗无光。休言胜败属秦越，自古边筹戒履霜。”诗中“履霜”一词，出自《易经·坤卦》之“履霜坚冰至”句。“戒履霜”意即：列强侵略中国乃是入侵日本的先兆，要严加防范，万不可掉以轻心。又如山田芳谷赋诗警告说：“勿恃内洋多礁沙，支那倾复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沂（应为沂）来欧罗巴。”诗中明确指出日本不能对英国等欧洲列强侵华一事抱以隔岸观火的漠然态度，必须以清朝政府战败为前车之鉴，加强戒备，以待不测。有的记载鸦片战争的书直接题名为《履霜录》，充分表达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民族危机感。^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威胁面前，一些曾对中国存有非分之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态度。如著名学者佐藤信渊在一八二三年曾著《宇内混同秘策》，鼓吹把整个世界变成日本的郡县，各国君主皆为日本的臣仆，甚至狂妄地主张：日本可重演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故伎，先分兵三路夺取中国东北，再沿清兵入关路线占领江南，征服中国，以此作为统一世界的第一步。^⑤然而，鸦片战争后列强虎视日本的冷酷现实，使佐藤信渊的思想为之一变。一八四九年他写成《存华挫夷论》，放弃了入侵中国的主张，转而认

为应“存中华，挫夷狄”，并热切希望中国“君臣苦心焦思，赈贫吊死，上下同劳苦，调练兵将。数年后乃起复仇义兵，征伐英夷，将其彻底逐出东洋，使中国永为日本之西方屏障。”⑥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等消息传到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一八五四年一年内，至少有《云南新话》、《清明军谈》、《外邦太平记》、《新说明清合战记》等四部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在日本社会上流传。写作年代不详的还有《鞞鞞胜败记》、《小刀会故事·满清纪事》等两部。这些小说的作者凭借有限的传闻，捕风捉影，加以想象，尽情描写自己心目中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们认为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鱼肉人民是导致起义的根本原因。《清明军谈》专辟一章，以鸦片战争时清政府败北、对英国屈从的经过作为背景，点明内战起因；《云南新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之役后酷吏横行，致使官逼民反。各书故事情节虽互有出入，但共同的主题都是把太平天国革命描写成一场反清复明的斗争。或说朱元璋在大元帅洪武龙、副将李伯玉（女）的辅佐下，率后明军攻占南京，称天德帝，大明复国；或说朱彰率民起义，称云南王，大败清军，领有江南川黔半壁江山；或说郑成功的后代子孙郑天麟拥戴明福王后裔朱乌建都南昌，重兴大明国等等。在作者笔下，复明军（即太平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连前来援助清政府的英国帮凶军也不得不投降。《云南新话》叙述说：云南王攻占南京后乘胜追击，不给英军以喘息之机，八万余英军被打得无立足之地，纷纷逃上英舰，但又遭到后明军猛将范文虎的火船攻击，七十余艘英舰所剩无几，狼狈逃归本国。上述离奇的情节当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编造，它包含了编者出于本国安危的考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类似明王朝的新兴政权，取代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以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由衷愿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自汉唐以来，中国先进的文化不断地传入日本。德川时代中日两国虽无正式外交关系，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日本历来把中国视为文化礼仪之邦，理

想强盛之国，对中国怀有深厚的尊敬友爱的感情。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巨变象一道道强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日本各阶层人士。堂堂的中华文明古国竟败于“夷狄”之手，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堪设想的事。他们痛恨清政府无能，致使国运衰微，故寄复兴中华的希望于太平天国革命。他们对中国的战败惊异，对中国的遭遇同情，对日本的前途忧虑。这种惊异、同情、忧虑的复杂心情相互交织感应，促进了日本有识之士的觉醒。

二

一八四三年斋藤竹堂著《鸦片始末》，痛斥了英国侵略者的横暴。佐久间象山为该书作跋，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教训，说：“当今天下可畏者莫大于外寇，而戒备之要莫过于知彼为先。”^①十年后，即一八五三年六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率舰四艘闯进浦贺湾，要求日本“开国”。次年三月再次前来，迫使幕府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在欧美列强的武力威逼下，幕府终于无可奈何地打开锁国大门。形势骤变。现在已不是为中国鸣不平，总结他人的教训而自警自戒的时候了。日本自身也同中国一样，开始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现实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要求了解西方，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

由于长期锁国以及幕府的愚民政策，当时除极少数知识分子外，广大日本民众的世界知识极端贫乏，对海外的理解相当幼稚，在他们眼里，所谓世界，不过是日本、中国、印度，不过是“大人国”、“小人国”、“长手国”、“长足国”一类的传说，有的人甚至对《山海经》上描述的“女儿国”、“一目国”、“穿胸国”等奇谈深信不疑。如何适应急转直下的形势？如何了解欧美各国的情况？这是“开国”后摆在日本民族面前的迫切任务。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世界史地著作以及用中文写成或翻译的西方著作均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早在十八世纪，日本已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史称兰学。“开国”后，主持幕政的开明派老中阿部正弘设立蕃书取调所，招集各藩的兰学者翻译西洋著作，传授西洋学问。然而，当时输入的西方书籍几乎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政治或史地书籍微乎其微，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另外，兰学者的外语水平也不高。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说，日方译员使用的是二百五十年以前的荷兰语。^⑧由于外语水平低，翻译的西方书籍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几乎无法卒读，使日本读者大为挠头。正如藤森大雅所说：“世上所译西洋书多拘泥原文，词义不通达，使读者昏昏然。”^⑨不难看出，单凭兰学这一股涓涓细流，根本满足不了日本社会急于了解西方世界的渴望。

德川时代的官学是朱子学，大多数日本学者都是儒学家。他们平素即习诵中国经史古典，精通汉文并不亚于中国学者。即使专治国学、研究佛法者也无不具有相当的汉语素养。汉文著作对日本学者来说更感亲切，更易于理解掌握。当时中国又有大量现成的介绍西方和世界的书籍，可供日本学者应急之需。远的如明末清初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南怀仁的《坤輿外记》，近则有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一八四二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代数学》（一八五三年）、与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一八五八年）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此外，还有许多报导国际时事的中文报刊杂志，如《六合丛谈》（一八五一年）、《遐迩贯珍》（一八五三年）等。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感愤于国难的著作，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对处于同样境地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大正时代民本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指出，“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凭借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洋乃是最好的捷径”，“可以说日本人所需要的知识，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求之于中国”，“日本是依靠中国书籍来广泛学习西洋文物的。”^⑩

因此，“开国”后，许多中国学者的著作或汉译西洋书籍经日

本学者训点、翻译，大量出版。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陈逢衡的《啖咕喇纪略》（一八五三年训点翻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八六一年训点翻印），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收于《他山之石》，刊年不明）。旅华西方传教士用汉文书写并经中国学者润色的著作，如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一八五八年翻印）、《英国志》（一八六一年训点翻印），裨理哲的《地球说略》（一八六〇年训点翻印），裨治文的《联邦志略》（一八六四年训点翻印），丁韪良的《万国公法》（一八六五年翻印）、《格物入门》（一八六八年翻印），理雅各的《智环启蒙》（一八六六年训点）。此外，上海、宁波、香港等地出版的中文报刊杂志如《中外杂志》、《中外新报》、《上海新闻》、《香港新闻》等，也先后被介绍到日本。而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者，首推魏源的《海国图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忧虑祖国衰殆，主张开眼世界，变法维新，寻求救国之路。魏源（字默深）就是这种思想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行者之一。一八四二年，他在挚友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六十卷，一八五二年又增补四十卷，成为百卷本巨著。《海国图志》以分析鸦片战争始末及论述守、战、款等国防战略的“筹海篇”开卷，“纵三千年，环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述各国沿革”，^①最后以介绍西洋天文知识和历法的“地球天文合论”终篇，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世界史地形势的最高水平。

一八五一年，中国贸易船运三部《海国图志》至日本，因书中载有关于天主教的文句，触犯了锁国禁令，被列为禁书，由幕府以每部银一百三十文的价格全部收购，归幕府御文库、学问所和老中牧野忠雄保管。一八五二年又输去一部，也归长崎会所保存。但一八五三年传来的十五部（每部书价上涨为银一百八十文），除幕府订购七部外，其余八部许可投入市场。^②该书之所以流入民间，显然与柏利扣关、对外关系顿形紧张有关。幕府不但解禁，而且允许

训点翻印，出版日译本。一八五四年七月，勘定奉行兼海防挂川路圣谟下令盐谷岩阴校订、箕作阮甫注释，翻印《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山传右卫门申请翻印出售《海国图志》的“阿墨利加州部”（美国部分），亦迅速得到幕府的批准。同年，又出版广濑达、正木笃和皇国隐士等有关美国部分的三个日译本，共计八种。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年三年内，训点翻印或出版的日译本多达二十二种。除“筹海篇”（一八五五年有日译本）和美国部分外，尚有英国部三种，俄国部二种，普、法、印度部各一种，海防部一种，“夷情备采”二种。经过训点翻印或出版日译本后，《海国图志》在日本广泛流传，启迪并震动了日本的思想舆论界。

训译者们纷纷在每种刊行书中前序后跋，高度评价《海国图志》的经世及学术价值，指出魏源编撰此书是“愤排洋夷跳踉，以备驳之而用”；在“幕末海禁告急之时最为有用”。它“纂述赅博”，“欲知洋国之概，足以取证”，而“非他书可比。”^⑬同时阐明训译的目的是“补海防于万一”，“对海卫边备必有裨益。”^⑭因此，为便于向民间各阶层普及，他们力求使译文通俗易懂，在专有名词旁附注假名，把原书中的中国年号改为日本年号，使“不辨洋学的一般人”也能理解。南洋悌谦在《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的自序中说：他作译解“抑欲施之水手辈，非供高明君子之览也”。杉本达为正木笃译《美理哥国总记和解》作跋说：此书“对于茫茫世界地理一无所知的幕末人也许会起某种作用。”^⑮

训译者们抒发对时局的感想，针对“开国”后崇洋恐洋现象，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启发民族反抗精神。一八五四年广濑达译《亚美利加总记》，自序说：“当今世人或傲然轻视外国人，或对之生恐怖之心，此皆因不了解海外情势之故。应使世人明白彼等之情势可畏而不可怖。这乃是读此书者的责任。”^⑯正木笃在《英吉利国总记和解》中指出：“即令英国窥伺东方，我国若无间隙，则虽有百国英夷前来亦不足惧。”^⑰盐谷岩阴在训点翻印《海国图志·俄罗斯国》的后记里追述故友松本实甫立志抗俄的往事，以激励“忧

国报国如实甫者”。盐谷说，二十年前曾与实甫同去拜访一位治西学者。宾客落座后，实甫见主人桌上有本西洋书，“取而翻阅之，则见书中插图上绘一母乳五子。实甫问：此何意？主人答：此喻洋夷哺育五大洲。实甫听罢，目光如炬，怒喷口沫，大声骂道：咄！天下岂有食汝臊乳者！自此以后，实甫讲究边防，尤其以俄虏为念”。实甫认为俄国“之所长在火器。然彼之所有，我亦有之，加之我国士矫刀利，若迫近鏖战，足可以一当百，则我岂无胜算！”每言及此，实甫“挥刀起舞，越墙斫柱，大呼曰：俄虏何当我一举！”^⑩

《海国图志》一书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价值，虽在日本大量出版，仍供不应求。数年之间，书价倍增。一八五一年每部银一百三十文，一八五九年上涨到银四百三十六文。^⑪幕末先觉者佐久间象山、尊王攘夷思想家吉田松阴以及尊攘派志士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竞相收集借阅，以先睹为快。他们作眉批，摘要点，写心得，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而且还邀请同仁“会读”，边读边议，共同讨论研究。一八五四年佐久间象山著《省愆录》，谈及他读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的感想时说：“其所论亦屡有不约而同者”，“予与魏源虽各生异域，互不知姓名”，然“所见不谋而合，确可引为海外同志。”^⑫同年，吉田松阴在阅读并抄录《海国图志》后，致书其兄说：“林则徐、魏源皆有志之士，尤其精通蟹行书（指横行排印的西文书），我以为无论如何也应当劝导我国有志之士阅读蟹行书，并著述如此良著。”^⑬一八五五年吉田松阴先后写出两篇《海国图志·筹海篇》的读后感，即《读甲寅咄囷（伦敦）评判记》和《读筹海篇》，文章虽对魏源的某些议论有所批评，但对书中的策略思想极为推崇，称赞它不仅制英，而且能制俄、法的侵略。^⑭魏源关于内外关系的论述——“民为内，夷为外，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对吉田松阴也深有影响。一八五三年三月，僧月性到长州藩游说，主张讨伐幕府。吉田松阴以为不可，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敌在外，岂国内相

责之时哉？”^②吉田松阴作为一个尊攘派思想家，他的思想认识在当时尚未达到只有打倒幕府方能抵御外敌的高度，直到安政大狱时遭到幕府的野蛮迫害，其思想才产生飞跃。尊攘运动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家桥本左内，在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不仅读过《海国图志》的日译本，还研究了原文并作注释。赖三树三郎更自己出资训点翻印了《海国图志》的“印度国部”，意欲以印度为例，教育国民。甚至那些历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学者读了《海国图志》后，也渐渐睁开眼睛，关注时势，驰参国事。如横山湖山这位一贯主张门徒应潜心攻读经史而无需过问国事的私塾先生，当一八五四年其弟子小野元济把翻译的《海国图志》的“英吉利广述”部分呈给他批阅，并请为作序时，被他一顿训斥，说小野违犯塾规，专事新奇，太不成体统！但待他阅读了译文后，迅即为文中所述英国人的桀黠和魏源的海防方略所感动，愤慨裂眦良久，终为小野的译文作序。横山湖山后来又为广瀨达翻译的《亚美利加总记后篇》写跋，热情地向读者介绍说：“吾友广瀨可称为慷慨之士，见近时之夷情，思国之情难止，为立御侮之方略而著作此书。”^③横山湖山态度的转变，生动地反映出《海国图志》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

魏源的《海国图志》可以说是使幕末日本知识分子开眼世界的最主要的一部启蒙书。土井赞方说：“佛法入中国，中国人以其学施泽，然后我受读之，故不劳而获。今荷兰之学未有汉译，而我直以吾学译之，徒多其卷帙，而指受素难，往往隔靴搔痒。在专门讲习者犹苦其难入，是无他，以无汉译故也。汉译之来，新论为始。”^④勿庸赘言，武力倒幕思想的先声——尊王攘夷思想是幕末日本国内外矛盾斗争的反映，但《海国图志》等中文书籍对尊攘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促进、刺激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一九〇二年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

的活剧。”^⑥梁氏所言西乡隆盛如何受《海国图志》的影响，固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就《海国图志》作为激发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及其学生等尊攘派觉悟的一个外界因素而言，梁氏上述论断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政局瞬息万变。西方殖民者步步进逼，幕府卖国投降的本来面目日益暴露。列强把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轨道，从而加速了日本封建经济的瓦解过程。黄金外流，物价飞涨，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生活困苦不堪，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阶级斗争越来越激化。以下级武士为核心的反幕府势力几经反复，从尊王攘夷派转变为武力倒幕派。在他们的领导下，终于推翻统治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府。在这个决定性的政局大转变中，倒幕派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倒幕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即来自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促使尊攘派走上武力倒幕道路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武力倒幕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高杉晋作认识上的转变与成长过程颇有典型意义。

高杉晋作出身长州藩的中级武士家庭，是吉田松阴的学生，深受吉田松阴尊攘思想的熏陶，与久坂玄瑞并称“松下村塾的双璧”。然而高杉晋作比其师吉田松阴更进一步，果敢地举起了武力倒幕的旗帜。高杉晋作之所以有此壮举，与他的上海之行分不开。一八六二年五月，高杉晋作搭乘幕府官船“千岁丸”西渡中国上海。自他踏上中国的土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蹂躏中国主权的悲惨图画就展现在他面前。据高杉晋作的日记《游清五录》记载，当时吴淞口外，黄浦江畔，所见之处皆抛锚停泊着欧美各国的商船军舰，“横花林森，欲埋津口”；江岸上，各国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